

2009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 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9/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97-1324-2

I. ①北… II. ①郑…②沈…③潘…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779 号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9)

编 者 / 郑也夫 沈 原 潘绥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吴学雅 王 绯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4 字 数 / 37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24-2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今年三系完成硕士论文共计 131 篇。招生数量逐年攀高，毕业论文随之递增。每年五六月份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且慢，以上措辞有欠准确。忙是真的，惜乎“乐”事不多矣。

本文集包含 7 篇论文。北大 5 篇，清华 1 篇，人大 1 篇。挑选唯质是从。但是无论如何，拿出这样的“配比”，令三位编者踌躇再三。没有挑战的工作是乏味的，但不曾料到我们今番面对的是这样的挑战。商讨了好一阵，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一篇就一篇。前几卷的前言都是一人撰写并署名。这次决定：共同撰文签名，一绳三蚂蚱，谁也跑不了。

清华社会学是小系，今年才 7 位硕士毕业生。一篇似乎不离谱。但今年清华的其他论文几乎没有和入选者比肩的，足以说明论文的滑坡。

人大 59 篇论文，才选出一篇，实为地震。三系中只有人大是两年制，应该说不无关系。但两年制非自今年始，今年的问题格外严重，肯定还有其他因素。

古人云：敬惜纸字。文字一经印刷便不胫而走，出山门前端赖老师傅严格把关，不敢降格以求。我们三位约定：若某年三系中任何一方没有够格入选的论文，本论文集便告终结。做这种事情，求欣然莫寻苦恼，是励志篇非安慰剂，属自愿上阵不是非做不可。说实在话，这活儿挺辛苦。倘若水准尚可持续，当勉力为之。假使基础不复存在，又何苦支撑？

论文集已是七龄童。其特征被同仁概括为：讲故事。这帽子

丝毫不令我们汗颜。我们鼓励的论文就是：讲个故事，说个理儿。原因无它：今日之中国盛产“故事”——大量新生事物等待着有志者去观察，诸多微妙事理期待着慧心人来洞悉。讲出事实，说透事理，已经蛮好了。提炼出理论是何等伟大，而粘贴标签则无聊之极。因此我们鼓励同学们做实在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直以来，定量的研究成果较少入选文集，很多同仁曾不吝指教。我们的答复是：请具体指出好的论文，我们对定量绝无成见，可惜没有看到。而我们以为硕士论文中优秀的定量成果稀少的原因是，优秀的定量研究者需兼备定量操作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良好感觉。两者集于一身，实属不易。很多搞定量的学生，数字模型能力好，社会问题感知弱。如此是难出优秀成果的。今年选入了一篇定量研究的论文，原因很简单，它在人大的5篇候选中赫然高于其他。

我们直率地表露自己的倾向，企图凭借论文集鼓励同学们走经验研究的路子，但不是对其他风格的好论文一点不宽容。这本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给了我们绝好的机会。作者述评的是加芬克爾的理论，刚巧加芬克爾提倡经验研究。是作者成全了编者。

某日在一家小馆歇脚，那碗拉面上得奇快。惊问跑堂的，答曰：师傅今天心情很好。有读者问：这篇前言何以如此短小？三位老师傅奉告：今日心情欠佳，待明年心情好了，吟诵长文。

临了，要感谢经济学家石小敏先生，他慨然解囊帮助我们为本书作者支付稿费。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2009年7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彻底经验取向下的社会秩序问题	
——加芬克尔的社会秩序观	雷 轲 1
“撤村”：作为一种过程的实践	李 楠 55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政治	
——分包劳动体制下的劳动控制与抗争	连佳佳 122
教做工：农民工第二代如何变成工人	梁自存 187
效率？网络？还是制度？	
——多元机制下的中小企业经济	辛济云 255
废品和垃圾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和主体性	张劫颖 302
儿女双全之谜	
——鉴村侗族的亲属关系	刘贞男 369
附录：三系 2009 年硕士论文题目汇总	434

彻底经验取向下的社会秩序问题

——加芬克尔的社会秩序观

雷 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6 级
指导教师 李 康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一 社会秩序问题的缘起及其对社会学的意义

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秩序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与有关现代性的反思紧密关联。正如德朗蒂所言，鉴于社会理论起源于现代早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德朗蒂，2003：32）。社会理论和现代性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对现代性的思考成为社会理论生生不息的活水泉源，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推动着现代性反思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诞生于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传统宗教的宇宙秩序观走向衰落，社会思想的世俗化与对新秩序的追求并驾齐驱，成为现代性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鲍曼认为，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凸现出来，成为不可能之最、必然之最，实在地说是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因为它将其他所有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鲍曼，1999）。作为现代性的关键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中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在现代早期，社会思想对秩序的探求便日益显现。现代性以一种不为人所熟知的面目逐渐显现，暧昧不明，难以捉摸，它绝非尽善尽美，也不是罪恶滔天，矛盾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项重要特征，秩序与混乱如影随形相互缠绕。“秩序就是非混乱的一切；混乱乃是无秩序的一切。秩序和混乱是现代之孪生儿。”“没有混乱的否定性，便没有秩序的肯定性；没有混乱，便没有秩序”（鲍曼，1999）。正是对混乱与战争的恐惧，促成了《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在人类的天性中找到三种造成争斗的原因：竞争、猜疑和荣誉，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中（霍布斯，1985：94）。要脱离战争的悲惨状态，人只能选择一个主权者，即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以便使他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霍布斯，1985：132）。霍布斯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以社会契约之名标举绝对专制论（麦克里兰，2003：209）。姑不论其理论暗含的保守主义倾向，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确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社会思想的发展。在新的思想潮流下，社会秩序问题研究取得不断发展。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霍布斯的观点似乎是说“没有国家（法律与秩序机制），社会（一般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麦克里兰，2003：210）。在霍布斯看来，社会脆弱而且缺乏独立性，如果没有国家的控制，人类的生存处境只能是一片混乱。这种有关社会秩序的悲观论调很快就被其后继者推翻。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与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在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发展中逐渐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自发而生的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观念日益普及，社会范畴获得更多的独立性，促成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中，孟德斯鸠和卢梭被涂尔干视为社会学的先驱。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相信社会现象具有固定和必然

的秩序，同时，正是孟德斯鸠首次确定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不仅了解了社会现象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参与塑造了两个基本观念，即类型的观念和法的观念。这对确立社会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涂尔干，2006a：44~45）。而在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解读中，涂尔干认为，卢梭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秩序的特殊性，他很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事实的秩序总体上不同于纯粹个体事实的秩序（涂尔干，2006a：60）。社会体系的基础，是客观上的利益一致状态以及舆论风尚和习俗状态。法律必然会表达事物的这种状态。一个个体不可能代表普遍意志，因为普遍意志超越于个体意志（涂尔干，2006a：93）。可见，在涂尔干对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诠释中，社会事实的独立解释地位便有所彰显，从规范决定的角度探讨社会秩序问题的取向已经初露端倪。

孔德创造了“社会学”一词，并因此被尊为社会学的创立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贡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分。这种区分大致涵括了秩序与变迁的观念，以及将社会学分析视为有关结构和功能的考察的观念（德朗蒂，2003：43）。孔德提出实证研究方案之后，社会学在斯宾塞那里获得了初步的系统发展。他为孔德的功能主义所折服，将其树立为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础。社会静力学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分析，而社会动力学则是对变迁的分析（德朗蒂，2003：45）。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斯宾塞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遵循自发的进化发展机制，而国家无疑是对社会的入侵，因而坚决主张将国家与社会区分开来（麦克里兰，2003：535~536）。尽管一再被人宣布“死亡”，但斯宾塞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及其对社会独立机制的强调和社会自发秩序的关注，在后来社会学的发展中其实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涂尔干继承和发展了功能主义社会观和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他主张社会现象是物，而且应该把它们作为物来研究（涂尔干，1995：47），以此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经验科学的研究取向在《自杀论》中得以示范。通过对自杀

问题的分析，涂尔干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整合”概念。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明确表明自己再三强调了现代经济生活存在着法律和道德的失范状态（涂尔干，2000：14），他强调劳动分工对社会团结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涂尔干，2000：26~27）。在其晚期的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通过对宗教问题的分析，展现了其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道德个人主义的理论企图（涂尔干，2006b：2），有关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问题的讨论得以在更为经验的层面上履行了其早期的方法主张。涂尔干在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中处于关键地位，一方面正是他为现代社会学确定了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主题，这就是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关注（谢立中，2005：158）；另一方面，他在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上的经验取向及其规范决定论观点也成为社会学发展过程中不断争论的焦点。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秩序问题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从政治社会思想中的哲学探讨，到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兴起，社会秩序问题一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社会学的形成、发展与有关社会秩序问题的讨论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随着社会范畴独立性的不断增强，以及实证主义的扩展延伸，从经验事实出发研究社会秩序问题的主张塑造了主流社会学的基本轮廓。涂尔干被公认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在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他的社会秩序观以及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必然会在社会学的后继者中得到新的解读和发展，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也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 主流社会学对秩序问题的探讨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早期，随着几位重要思想家的相继辞世，欧洲社会理论逐步走向衰落，而在大洋彼岸，美国社会理论开始崛起（德朗蒂，2003：49~54），社会理论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社会学在美国找到新大陆。在这一重大转变中，帕森斯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早年留学欧洲，深受欧洲社会思想的影响，马歇尔、马林诺夫斯基、韦伯、涂尔干、帕累托等人的思想都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可以说，帕森斯及其早期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就是社会理论重镇从欧洲转向美国的标志。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帕森斯系统地整理了欧洲主流社会思想的有益内涵，对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吸收，对社会行动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建立了所谓的“唯意志论行动理论”。此后，随着帕森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学的发展总体上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所主导，帕森斯有关行动、结构和社会秩序问题的思考形塑和代表了主流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有关秩序问题的讨论与行动理论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互为依托，正是在建立其唯意志论行动论的过程中，帕森斯开宗明义把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作为讨论的起点（帕森斯，2003：100～106）。而且，正如德朗蒂所言，贯穿帕森斯著作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德朗蒂，2003：53）只是帕森斯并没有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单独处理，而是从行动问题入手进行讨论的。帕森斯的学科背景，决定了他有关行动理论的分析要从经济学的个人理性选择和功利主义理论出发。在他看来，功利主义视野下的行动者积极追求个人的目标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条件是什么，选择的限制从何而来，社会的秩序如何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帕森斯综合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观念论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提炼。总体上来说，帕森斯对秩序问题的处理源自于对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行动模式的批判，他主要是从韦伯的行动理论和涂尔干的集体良心或集体表象中吸取灵感，其解决方式基本上是涂尔干式的：社会共享价值与规范在人格结构的需要—性情中的内化（贝尔特，2002：57）。

帕森斯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分析，尽管博采众家之长，但也存在严重的局限，这种局限根植于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之中。受帕

森斯影响和主导的主流社会学，延续了传统功能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各组成部分因其功能上的必要性而存在，相互关联以实现社会整体的目标。帕森斯自称是“无可救药的理论家”，这在他的系统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具体的社会现象被化约为简明的概念框架，模式变量和 AGIL 图式就是这种概念化理论构造的典型。所有经验细节都在这样的理论化约之中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理论分析的原料和废品。社会学研究在帕森斯手上沦为了概念游戏，自成一体的宏大理论体系代替了“琐碎无序”的经验事实。在功能主义视角下，任何不具有功能必要性的因素都被排除在社会系统的分析之外，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预设了一个封闭自足的稳定体系，经验现象中存在的混乱、冲突和不协调经过概念化过滤变得隐而不见。社会各部分在这样的理论分析中清晰地呈现出整体的协调和稳定，社会系统内部的秩序因为结构的功能而保持稳定。

不管是早期的行动理论还是后期的系统分析，帕森斯都很强调社会对个人行动者的制约，以及社会作为一个自足体系的稳定性和内部协调性。在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理论体系的构造代替了经验事实的深入研究，社会秩序问题被转化为行动者对外在规范的内化，以及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功能协调性和互补性构成的系统整合。帕森斯的这种理论化概念操作和保守的社会秩序观在 20 世纪中期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正是在对帕森斯所代表的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中，社会冲突论、理性选择理论、符号互动论等新的社会学思想纷纷崛起，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社会学的视野。

在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应该要算米尔斯及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米尔斯表明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反对把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米尔斯，2001：17，18）。米尔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主流社会学的“抽象经验主义”，他认为“方法

论的抑制其实和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一样糟糕”（米尔斯，2001：54）。

在米尔斯看来，宏大理论几乎等于概念的组合和分解，思考层次太一般化导致理论家无法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而寓于理论体系的概念游戏（米尔斯，2001：35）。在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米尔斯也把社会秩序问题置于讨论的中心。米尔斯认为，帕森斯提出的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结构是一个错误，社会整合的实现其实并不一定全赖于此。他通过举例说明，在另一种极端类型的社会中强加的纪律也有同样的整合作用，而在“共同价值的系统”和强加的纪律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整合”（米尔斯，2001：42）。米尔斯非常强调接触历史真实和进行经验考察的重要性，在社会秩序问题上，他明确指出了概念化理论体系的不足，认为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实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米尔斯，2001：49）。

在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米尔斯一再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所希望的经验主义与主流社会学的经验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米尔斯将主流社会学的研究风格称为“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这样就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即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米尔斯，2001：61）。抽象经验主义以科学性自居，遵循严格标准化的研究程序，从理论假设、概念操作化到数据搜集整理分析以及研究报告的写作都遵循科学的操作程序。抽象经验主义以其科学的专业术语、操作化变量和统计分析塑造自身的专业形象，这种方法程序的精致化的执著，并不能改变其方法的狭隘和研究成果的贫乏。米尔斯认为，像抽象经验主义那样过于谨慎和严格的经验主义，并没有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和论题（米尔斯，2001：77）。因此，米尔斯主张我们需要一种视野开阔得多的经验

主义。

对帕森斯主义主流社会学的批判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时尚，几乎任何一种新兴理论的发展都建立在与帕森斯对话的基础上。除去各自理论取向的差异，这些“反帕森斯主义理论”基本上都不满意帕森斯结构功能视角下的规范决定论社会秩序观；同时对主流社会学的“科学方法”也提出了种种质疑，米尔斯的批评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各种新兴社会学理论都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建设，对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发展新研究途径。例如在结构功能主义内部就出现了默顿的“中层理论”、亚历山大等人的“新功能主义”，此外，社会冲突论提出了冲突对于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问题的重要意义；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互动论则更注重社会实践、人际互动、社会认知等问题在社会学以及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股批判和发展帕森斯主义主流社会学的潮流中，一种从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方法出发关注经验细节的社会秩序问题研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创立者称之为“常人方法学”。

三 常人方法学兴起的必然性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一词是加芬克尔个人的创造，其字面意思早已众所周知。^①但由于对常人方法学的实质内涵存在严重的误解和忽视，许多批评认为常人方法学是一种失败的符号互动论，或者是改头换面的现象学社会学，极端关注混乱琐碎的经验细节，而对真正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可惜这些批评都没有切中要害，甚至完全没有理解常人方法学的基本

^① 加芬克尔指出，“常人方法学”是对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和其他实践行动（practical actions）的理性特征（rational properties）的研究，这些表达和行动本身则是日常生活中组织化的巧妙实践权宜性地持续实现的成就（accomplishments）（参见 Garfinkel, 1967: 11, VII；亦可参考 Livingston, 1987: 3, 12）。

关照。

常人方法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兴起其实正是源于对社会根本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的深入的经验研究。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继承了帕森斯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将社会秩序问题作为其核心问题，正如博登所言“常人方法学的基本转折就是将帕森斯的秩序问题颠倒过来”（转引自李猛，1999b：52）。常人方法学一方面与帕森斯理论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关联，同时也因其根本不同的研究取向而相区别。

常人方法学首先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20世纪全球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迁——两次世界大战、长期冷战对峙、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长期而广泛的经济危机，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国际角色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获得的成功，在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获得了霸主地位，其世界霸主秩序理论大行其道。但是大萧条的危机刚刚离去不远，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的关切并不因为经济复苏而淡化。随着国际事务的逐步正常化，民众的敏感神经开始转向国内，人们看到一幅完全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勾勒的景象。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强大”覆盖力和渗透力，并没有使每个社会行动者各安其分、和谐共处。相反，随着各种国际国内危机的加重，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帕森斯主义的宏大理论对此没有基本的敏感度，因此也缺乏解释力。对于社会问题的具体关切，以及对主流社会价值作用的质疑，催生了包括常人方法学在内的各种新兴理论。

常人方法学的兴起根植于特定的理论语境。如前文所述，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为常人方法学设定了最初的基础，特别是在社会秩序问题上，加芬克尔是直接继承了帕森斯的这一基本关注，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使整个帕森斯的秩序理论摆脱了唯意志论的色彩，而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经验角度来理解社会秩序（李猛，1999b：46）。常人方法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于对主流社会学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基础之上。与此同时，现象学社会学特别是舒茨和古尔维奇的思想，对常人方法学的发

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常人方法学有关意义问题、沟通努力的讨论以及对现象和细节的重视大多得益于此。此外，实用主义思想特别是符号互动论对常人方法学也影响至深，对实践问题和行动者互动秩序问题的讨论，在双方的对话和争执中不断深入。除此之外，米尔斯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以及他的“说明理论”（Mills, 1940），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对规则问题的探讨、“以言行事”的基本理论都在常人方法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灵感来源。^①

除了外部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常人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加芬克尔的个人经历也是紧密关联的。加芬克尔成长于一个犹太人社区，时值社会动荡和种族问题严重的年代，切身的体会使他天生就对社会问题抱有兴趣。在机缘巧合之下，加芬克尔进入了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会计和商业课程使他获得了“说明”问题和科学化的统计描述方面的最初触动；由于朋友的影响，加芬克尔对社会学和现象学社会学产生兴趣，并由此奠定了他的基本思考方向。他与帕森斯、舒茨、古尔维奇等人的接触对常人方法学的理论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加芬克尔对陪审团的研究，以及在军队的教学训练工作都深深地影响到了常人方法学后来的经验方法和表述风格（Rawls, 2002: 9-17）。正是创立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造就了常人方法学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常人方法学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从经验细节对此加以把握的基本取向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① 参见《哲学研究》中对规则和规则遵守的讨论（维特根斯坦，2007：85～133）。亦可参考李猛，1999b：49。

第二章 沟通之作为秩序问题的切入点： 常人方法学的理论奠基及其 经验取向的萌芽

一 常人方法学的理论奠基

正如帕森斯是在建立行动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秩序问题，加芬克尔有关社会秩序的研究也源自对社会行动问题的讨论，社会秩序问题始终与行动问题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从加芬克尔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对社会秩序问题的集中讨论是相对晚近的新进展，其早期著述更多地聚焦于行动、沟通^①和实践等问题。社会秩序问题可以被认为在加芬克尔的早期著述中含而未露，但不容忽视的是其早期著述对后来更为明确的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和奠基作用。

《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常人方法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加芬克尔思想的基本成型。正是由于该书在加芬克尔思想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把1967年该书出版之前的研究视为加芬克尔思想发展的萌芽和奠基阶段，而把1967年之后的研究作为其思想正式确立和发展的阶段，其中2002年《常人方法学纲领》(*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working out Durkheim's aphorism*)的出版则表明常人方法学进一步聚焦于社会秩序问题的经验研究。

那么，基于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核心考量，1967年之前的研究是否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呢？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包括若干论文，

① 加芬克尔避免使用“互动”(interaction)这一行为主义色彩浓重的术语，转用“沟通”(communication)一词赋予其实践的意义。加芬克尔认为，在去除刺激-反应(S-R)模式意涵的情况下，通常所说的互动就等同于沟通(参见Garfinkel, 2006: 179)。